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蔡英文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蔡英文 著

中生代
思想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蔡英文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

ISBN 7-80148-883-0

I. 政… II. 蔡… III. 阿伦特, H.

(1906~1975)—政治思想 IV. D09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840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191 千

版次:2006 年 3 月第一版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蔡英文 1952年生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政治研究所博士，剑桥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及政治思想专题研究中心执行长。



三辉图书

策划人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刘刚
特约编辑 / 依稀
装帧设计 / 林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自序

写这本书的构想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凭借个人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喜爱以及翻译过她的两本论著,而有了探讨与阐释她思想的计划。这个写作计划因个人负笈英国,以及回国后教学忙碌,而拖延至今。现在完成了它,内心有如释重负之感。一来实现了早年的承诺,二来表示了对这位影响我甚深的思想家的尊重。

对于一位西方的思想家投注那么多时间与精神,扪心自问:她的魅力何在?或许是一种情感,早年在刚阅览她的论著时,总给我一种洋溢着思想之生气的感动,这也许来自于阿伦特对人的生命的基本处境有一种深刻之洞识,而且是以一种“非学院式”的论述来呈现。除此之外,大概是一种了解的好奇,在阅读她的《人之境况》一书时,感受深刻的在于,阿伦特赋予人的政治实践一种崇高伟大的存在意义,这种违反常识的见解激发我进

一步探索她思想的兴趣。

认识一位思想家如同结识一位朋友一样，是有其机缘的。若非在英国约克大学遇见一位热爱阿伦特思想的指导教授——大卫·爱德华(David S. Edwards)，我对阿伦特思想的喜好就无法转变成知识上的研究。在他的鼓励下，阿伦特以及与她同一世代的英国政治哲学家麦可·欧克秀变成了我在英国求学的关注课题。也因这四年的求知，让我得以一窥西方政治思想之堂奥。

这本著作最后得以完成，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同仁朋友：郭秋永先生、张福建先生、萧高彦先生与苏文流先生在学问上的切磋与情感上的支持。另外，特别感谢台湾大学政治系江宜桦教授——阿伦特思想的同好——这几年来，在生活与知识上的帮忙。这本书的写作构想是我在东海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形成，犹记得当时跟三位好友：陈荣灼、罗晓南与黄瑞祺，相互激励而度过的读书光阴。

感谢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林载爵先生慨然答应出版这本著作。李国维与黄俊龙两位先生帮我处理打字与编辑之事务，在此致谢。

本书的第四章“公共空间的开展”原先登载于钱永祥与戴华主编的《哲学与公共政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第269-312页。)，原先的标题为“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问题”；第六章“国家主权的决断与公民的政治参与”原登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第27期(1997年9月)，第139-171页。原先的标题为“两种政治之概

念：卡尔·史密特与汉娜·阿伦特”；第七章“人民主权与制宪权”登刊于台北《当代》第150期/复刊第32期（2000年2月1日），第44-60页；第八章“历史叙事与人的认同”原登刊于《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6月），第103-122页，原先标题为“政治实践与历史叙述：论说汉娜·阿伦特的历史理念”。

蔡英文

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目 次

自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极权主义与西方现代性	13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控制	14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极权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	17
群众与极权主义运动	20
“犹太人命运”与西方现代性之限制	21
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基本人权	26
西方现代性之反思	36
第二章 政治思辨的取向	42
卸除形而上学之根基	46
对政治哲学传统之批判	48
翻转表象与实在之形而上学两元论	51
不着形而上学根基的政治思辨	57
第三章 行动之理论	61
实践之概念的基本含义	62

劳动生产的现象本质	64
“制造”或“工作”的活动形态	69
“实践”的活动形态	75
第四章 公共空间的开展	89
极权统治与公共领域的销毁	92
公共空间的语义界定	96
公共领域的两种模式	101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	110
公共领域理论与行动理论	120
公共空间与现代市民社会	127
公共空间的议题	132
第五章 历史叙事与人的自我认同	138
第六章 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纠葛	154
公民之美德	159
政治美德与个人道德意义的含混性	165
政治之恶与内省之良知	177
判断与政治实践	190
小结	205
第七章 革命、人民主权与制宪权	209
自由之深渊	210
制宪权力与创制基础的正当性	213
法国大革命的“制宪权”与人民意志	214
伟大不朽之立法者	217
美国革命的宪政共和主义理想	221
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225

结语	227
第八章 国家主权的决断与公民的政治参与	230
友与敌的分判,以及国家主权之决断论	234
公共领域与公民之政治行动	240
两种对立的解释模式及其历史资源	249
问题与讨论	260
结语	265
参考书目	282

绪 论

汉娜·阿伦特无疑是当代西方深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她的政治思想一直持续地激发学者的政治想象,带给学院之政治学者阐释与议论的兴趣。在 50 年代,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英美地区了解极权主义政治模式的重要典范。60 年代,美国学生与民权运动时期,阿伦特在 1958 年写成的《人之境况》(*Human Condition*)所阐发的“激进民主”的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之现代社会的批判观点,激励了运动的参与者,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招致艾萨·柏林(Isaiah Berlin, 1909 - 1997)的批判,指责这种激进之民主理念蕴含虚无主义之作风〔1〕。也在这段时期,阿伦特因观察艾克曼的审判,而于 1962 年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克曼:对于罪恶之平常

〔1〕 Michael Ignatieff, *Isaiah Berlin, A Lif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8), pp. 253 - 255.

性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贯穿这本论著的一项论证主题乃是:缺乏思辨反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作判断即是个人与集体犯下政治罪恶的原因之一。在这本书中,阿伦特亦批判其犹太同胞面对政治之恶的残害,不但不思抵抗,甚至有些还与纳粹串谋。这种观点引起舆论哗然,也使阿伦特遭到犹太同胞的谴责。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艾克曼审判”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而走进探索人之思维、意志与判断活动的哲学课题。她对这些课题之研究成果在1971年发表于英国爱伯丁大学的“基佛讲座”,但她只谈论了“思维”与“意志”两个部分,1975年12月,当她预备撰写“论判断”部分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在1970年代,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 -)的《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建立了政治哲学论述的另一典范,在英美的学术界与公共论坛激发所谓“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议。在这一时期,阿伦特的古典共和民主理念影响到了“社群主义”阵营里,如华尔哲(Michael Walzer,1935 -)与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的市民社会论述。她的“公共领域”的理念也提供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发展“沟通行动理论”的资源。但是,使阿伦特政治思想复苏的关键,则是1989年苏联与东欧政权崩解,以及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的阐述:“1989年东欧之公民自觉以及因此而起推倒〔极权〕政府的政治运动提供‘阿伦特式’(全然非马克思式)革命的一种活生生的范例。以最近这种政治经验来看,

阿伦特对民主的了解虽然问题与疑难依旧,但较之从前,似是更具说服力。”〔1〕阿伦特倡导的重要政治理念:非实利目的、自发性、创新性的行动(*praxis*),以及公民之权力与公共领域之开展等理念又重新激发西方之政治意象与论述。不仅如此,19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feminism)重新检验阿伦特的“人之认同”的论述,以及“公/私领域”、“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区分,使得这位不那么肯认“女性认同”或者排斥任何“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思想家也成为女性论述的焦点〔2〕。

关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影响,尚有一个论议主题是值得提示的。阿伦特在1963年出版了《论革命》,在这本论著中,阿伦特经由美国独立建国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事,阐释革命实践与自由宪政构成相关的问题。阿伦特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除了讨论政治实践与道德的议题之外,她所关切的课题在于,行动的创新性与制度规范之间互动的关系。依阿伦特的观察,革命实践体现了个人与群体之“开端启新”的自由能力:革命一方面解放桎梏,另一方面则尝试建立宪政体制以保障与维系此自由之能动性。置身于此革命实践之形势当中,革命分子

〔1〕 Margaret Canovant, “Hannah Arendt: Republicanism and Democracy,” in *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eds.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52.

〔2〕 关于这方面文章,重要者见 Mary Dietz, “Hannah Arendt and Feminist Politics,” in *Hannah Arendt: Critical Essays*, eds. L. Hinchman and S. Hinchman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4);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Hannah Arendt*, ed. B. Honig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Press, 1995); Hannah Patkin, *The Attack of the Blob: Hannah Arendt's Concept of the Social*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与团体皆体认了阿伦特所肯定的行动创新以及群策群力的权力。但是在其中,他们也体会了任何创新之行动及其权力所具有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具体来说,他们在大肆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中,如何用一种正当性地位去确立所谓“自由宪政”?在解释此问题上,阿伦特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西耶尔(Emmanuel Josephy Sieyès, 1748 - 1836)的“*Pouvoir Constituant*”(制宪权)的概念,作为论述的取向。

Pouvoir Constituant, 广义来说,乃指外于或先于既定之体制的权力,狭义来说,则指个别法律以及创立体制之基础的权力。在革命期间,这种权力在它从事制订新宪法以及创立新体制的时刻,激发种种疑难,特别是:这权力既然是先于与外于既定体制的权力,它的制宪与创制的正当性基础如何取得有效性的论据?针对此问题,阿伦特从国家主权、自然法则、自然权利、权威与权力各方面作了分析与解释。同时,她透过这两次革命的对比,说明革命实践及其权力如何能确立与持久保持自由宪政体制。

就阿伦特个人政治思想的发展而言,她的革命论议亦代表她反思性地阐释她在《人之境况》一书中所表述的行动理论。在这本论著中,阿伦特相当强调人行动的创发性,或者她所指称的“开端启新”的原创性,而忽略了此原创性之力量可能遭受到的体制或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强调行动的此种特性上,阿伦特受古希腊政治理念的影响,把体制的创立(包括立法)跟行动的实践相分离。因此,她早期的政治思想无法强有力地论证一切跟宪政体制相关的,诸如法治、权威以及制度性之规范等议

题。而《论革命》一书尽管处理的是美国与法国革命的历史事件,她的解释却是关切这些为她早期政治思想所忽略的议题。在此,阿伦特从古罗马共和的宪政法治传承中,汲取论证的资源,冀望能调和行动之创发性与法治程序和宪政制度之规范,而形成她晚期之“自由宪政之共和主义”的宪政思想。

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对 *Pouvoir Constituant* 的解释观点,连同她的行动之原创性与根源性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亦影响当代“激进民主”的论议,特别是欧陆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民主理念。举其要者,如法国的雷侯(Claude Lefort),他以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与“公共领域”之概念为资源,阐释民主的特质在于把争议正当性视之为体制之正当性基础,而且容许此争议无法达成共识之可能性。又譬如,意大利激进左派之知识分子涅格(Antonio Negri),重新阐释 *Pouvoir Constituant* 在现代主权国家发展脉络中的意义,并给予它一种存在论的意涵,进而阐释民主的基本权力观乃在于不断抗拒,甚至颠覆既定体制的权力〔1〕。

对于西方当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而言,阿伦特诚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欲全面性地、如实地阐释她的政治思想并非易事。阿伦特不喜好建立思想体系,甚至否定思想体系的建构。在她看来,思想的体系化很容易扼杀思考的活力,使思想陷于僵化。因此,她的政治思想著作除了《人之境况》较

〔1〕 Antonio Negri,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trans. Maurizio Boscagl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具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之外,其他的不是透过历史事件的叙事,就是针对现实政治之议题,或者她认为对人之政治存在特别有意义的课题,陈述她“成一家之言”的政治理念。这种论述的方式或风格有其独特之魅力,但也伴随着她思想观念的表达前后不连贯,甚至相互矛盾。再者,若以严格的哲学分析来审视阿伦特的思想,那么,许多观念的构成(譬如,“公共领域”、“社会性”[the Social]、“世界性”[the Worldliness]……)都显得浮泛,经不起分析。为解决这种阐释上的困难,学院的学者中有的寻究阿伦特思想内在的矛盾性,给予严厉的批判,或者为此而给予同情式的了解或辩解,有的则是作一种重构式的解释,以消弭此思想内在的矛盾。

因此,如何阐述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本身也就成为一个问题。阿伦特的政治思想的表达诚然有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缺陷”,但是作为一位具有原创力的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在了解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的意义上,到底提供给我们什么识见?就阐释的立场,阿伦特基于什么关怀,或者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能有这些识见?以及她运用什么思想资源营构论证的脉络?这些都是阐释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必须考虑的课题。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之形构是从她在1958年写成的《人之境况》为起始,构成她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如“剧场式”(dramaturgic)的行动概念、“公共领域”的概念都在这本论著中有了系统性的论证与说明。她以这两个概念为基调,回旋地扩展与深化她的政治思想的范围与内涵;在1960年代,此思想的扩展转入了革命的论议以及深究政治与道德相关的课题,在